

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大陆的最后岁月(上)

蒋介石决定改组中统、军统组织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由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唐纵、郑介民、戴笠、李士珍 7 人组成小组,负责设计特务组织的改革方案。他们秉承蒋的意思,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方法,要把中统与军统分别换名改组,既要保留住两大特务组织的实体,又要堵住反对者之口。蒋介石同意这一原则。

由于军事的特殊需要,军统局的改革方案是由军委会转归国防部辖下,改组成立国防部保密局,对外宣称负责军事保密工作,这在大面上也说得过去,不会遭到强烈反对。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桂系的白崇禧,他有职无权,实际上军事大权控制在参谋总长陈诚手中,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一切仍听蒋指挥。军统的结局便如此决定了。而中统的处理则比较难办,原因在于党内派系的内斗和对党务机构的争夺。中统局自己的意见原是想改组成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机构,归入国家司法系统,但这一方案受到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的坚决反对,他不要这个特务组织。于是陈立夫与内政部长张厉生商量,要在行政院内政部里增设一个调查局来容纳中统。张厉生表示同意,但在立法院讨论时,这一方案却受到群起攻之,没有办成。直到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后的 1949 年,才最后实现。

中统局改组陷入困境,陈

立夫与中统一帮人最后决定将中统局仍保留在国民党中央系统,以免受到政府立法部门的制约。他们议定新机构的名称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归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辖下,其规模缩小到原来的 2/5 或 1/2。这一过程,几经商量,反复研究,历时一年多,才最后报蒋介石批准。

1947 年秋,“中央党员通讯局”正式成立,中统历史进入衰退的新阶段。

中统被改组为内政部调查局

1949 年 3 至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蒋家王朝已穷途末路。但蒋介石仍紧抓特务不放,按照既往政策,对中央党员通讯局再次进行了改组与调整。具体方案是将其再次降格,从“党”归“政”,划归行政院内政部所辖,改称为内政部调查局,但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保留了一段时间。

1949 年 5 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开张,中统组织从此更趋末路。

季源溥出任内调局局长后,上台伊始,便亲赴台湾建立局本部;派张益民由广州到重庆,筹建在大西南的内调局指挥中心;派朱凌云到香港,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并指挥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甚至派人前往东南亚进行海外活动,预备将来。蒋介石为了给他们打气,慷慨地一次拨给内调局 10 万银元,想让他们“重振雄风”。

但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江浙,进军

闽南,逼向广东,于 10 月 14 日抵达广州。季源溥的新组织还没有真正形成队伍,即四散逃亡了。党通局、内调局的特务们,知道大势已去,除一部分由王保身带往台湾外,其余随政府其他部门一起,提前于 9 月初乘飞机逃到了重庆。

季源溥一到重庆,便向蒋介石和内政部长李汉魂再次申请应变经费,结果碰了钉子。季又找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求王拨给他 10 个远迈县,让特务刘介鲁等 10 人专门出任县长,号称要“建成游击根据地,以与共产党周旋”。10 人名单送王陵基后,还没有来得及批准,这些县就已经被解放或临近解放了,因此计划只好作罢。

季源溥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台,他下令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自己飞往台湾。张益民见此,也不愿殉葬;在解放军尚未进逼重庆时,他考虑经昆明外逃这条路线比较稳当,于是,一面布置特务在昆明搞潜伏,一面命令特务协助铁路公路部门,保证维持滇越、滇緬交通线的畅通,并和滇越边境金平县的土司建立联系,除加强已有的滇西区室外,在滇南、滇东再分划各建一个区调查室。但是到 11 月间张益民准备经昆明逃跑时,实行大迂回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切断了他们的去路。此时,除了坐飞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逃走。11 月 23 日重庆解放,特务们逃到成都以后,张益民便丢弃手下,乘飞机逃往香港。

中统特务仓皇逃命

正副局长逃走后,时任内

调局西南区区长徐政,心里十分恐慌,特别是他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得知中共已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更是坐立不安,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逃到台湾去。正巧中统创始人陈立夫来到成都,徐政连忙跑去见陈央求。陈立夫安慰道:尽可放心,只要能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徐对此回答心里彻底失望,他再提出去台湾的要求,陈立夫要他去找总裁侍从室主任谷正纲。徐政一再恳求,谷就是不让步,绝望中徐竟当场跪在谷的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最后才被允诺。

徐政逃走以后,剩下内调局本部的一批特务不知所措,一次次地向台湾发出求救的电报,度日如年地等了一周,季源溥才来电给了逃去的几十个飞机座位。这么多特务都吵着要去,你争我夺,谁也不让步。当时,各机关也都想逃到台湾,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时,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内调局抽的是第 13 批飞机,运气不佳。到 12 月中旬第 8 批飞机飞来时,新津附近发现了解放军,国民党的空军站仓皇撤退,机场也被破坏,第 13 批飞机永远不会再来了。特务们架起发报机一遍又一遍地向台湾呼救,结果连回电也没有了。留下的 100 多个内调局特务,把剩下的六七十两黄金予以平分,每人拿了五钱,各自逃命去了。

这就是中统特务的最后下场。(未完待续)

(摘自《国民党特务活动史》)

露面。原来,她冒死“泗海”偷渡香港,在海上漂泊了 10 个小时到达香港后,与先行偷渡抵港的与后夫所生的小儿子,在香港短暂停留后,就去了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陈子美先在华人开的医院当产科医生,积累了些钱后,开办了一家私人产科医院,很受华人的欢迎。

1975 年,陈子美到美国定居。1982 年,陈子美在纽约皇后区的雷哥公园买下一个合作公寓单元。1991 年,她生病入院时,被人偷走放在寓所内的一生积蓄,生活陷入困境。年近 90 的她,只好向联邦政府申请养老生活补助救济金。由于每月只有 400 多美元,而合作公寓的维持费每月就需 400 美元。因此,从 1993 年起,她每月都无法缴清公寓维持费,到期共积欠约 1.4 万美元。于是,管理公司向法院起诉,面临判决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之时,她被迫向媒体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后在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才摆脱了困境。

1997 年,陈子美在大陆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得知母亲还健在美国,寻求外交部门的帮助,与久别的母亲取得了联系。陈子美也想回祖国看看,与亲生女儿团圆,但因年事已高,一直未能如愿。

2008 年 2 月 25 日,她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4 月 14 日下午 4 时,她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冷清离世,因无人过问,后事拖了一月之余。

(摘自《羊城晚报》)

《南征北战》拍摄记

《南征北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军事故事片。1951 年春,中央电影局及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反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争片。成荫由于在此之前成功拍摄了《钢铁战士》而被点名担任该片导演。

成荫领命后很快组建了一支创作班子,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 3 位部队作家负责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为了写好适合拍摄的剧本,沈西蒙率创作组深入当年参战部队进行采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终于写出了剧本第一稿。江青看了稿子后很不满意,认为剧本里高营长和区长的爱情描写,损坏了人物形象,必须要删去。尽管剧中爱情描写的分量并不多,但它却涉及全剧结构,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成荫和沈西蒙改来改去,却总是难以圆满,一时间急得团团转。《南征北战》开拍之时,正值毛泽东亲自发动批判《武训传》,剧组因此也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没有保险的剧本,谁也不敢贸然开机。如此折腾来折腾去,一晃半年时间过去了,上影厂领导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情急之下,他们找到曾拍摄过军事片《耿海林回家》的导演汤晓丹来“救火”。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摄制组同拍一部片子的奇特现象。这两套班子做了分工,成荫重点拍解放军方面的戏,汤晓丹重点拍国民党方面的戏。

《南征北战》不仅拍得艰苦,而且险情丛生。因为当时拍片用的炸药都是真的,而且所埋的 TNT 炸药重达一公斤,其威力可以炸翻一个水泥碉堡。拍摄时为防止意外,相关人员都要在埋炸药的地方画上保险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成荫对大家说:“往死里干!死一两个没关系,真干!”结果拍摄时,导演成荫挂了彩,腿上被弹出的雷管并列地崩了两个小窟窿。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两次事故也使成荫心痛不已。那是在拍摄过程中当一辆坦克开过时,路边围观人群中有个 14 岁小孩突然蹿上前去想看个仔细,不幸被坦克履带卷了进去!另外一次运输道具的大卡车在途中爆胎,车辆失去重心,翻到沟里,几个年轻押运员受伤。经过全摄制组近一年的艰苦奋斗,1952 年八一前夕,电影《南征北战》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据《天天新报》)

卓别林的第一枚勋章

1921 年 10 月,卓别林来到巴黎,受到了巴黎人民空前的欢迎。法国政府鉴于他在世界艺术领域的巨大贡献,决定给他授勋。授勋前,一位美国记者向卓别林透露说:法国政府在捉弄你,那勋章是他们授予学校教师的,你领这个不够光荣,你应该领那有红色绶带的荣誉军团勋章。

卓别林笑着答道:“不,先生,您错了。教师是全人类都尊敬的人,我能得到学校教师的光荣,这将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快乐。”卓别林高兴地接受了法国政府颁给他的教师勋章。给他授勋的证书上写着:“查尔斯·卓别林,戏剧家、民众教育学士……”这块勋章,也是卓别林一生中第一次接受的勋章。(摘自《中外艺术》)

世界航天史上的第一人

明朝木匠万户的飞天壮举

航天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梦想,只是苦于没有交通工具,数百年间这个梦想一直停靠在无数人的心里无法成行。明朝时,情况大为改变,随着一系列战争的进行,当时国内的兵器工业取得了重大进步,尤其是“火箭”技术的提高,使一个名叫万户的人最终将这个千百年的梦想付诸行动,成为世界航天史上的第一人!

背负好友的梦想

万户生于明朝初年,原本是个富家子弟,从小喜欢发明创造。为了让自己的天赋产生最大的价值,毅然放弃科考,参军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第一线。

他改造了一系列武器,刀、枪、箭、炮无所不包。当时明朝和蒙古常有大规模交战,他的这些发明让明军屡获战功,大将班背因此十分欣赏他,把他调动到兵器局专心武器研发。班背的兴趣重点是在当时的火箭技术改良上,梦想能制造出一飞冲天的“飞鸟”。班背是个十分正直的人,得罪了右中郎李广太,被关在拒马河上游的深山中。看到好友受难,万户想尽办法要加以营救。燕王朱棣正笼络人才,李广太为了巴结朱棣,推荐了精通尖端兵器技术的万户。但是他知道万户为班背的关系,所以多次威逼利诱。万户为了帮好友早日脱离苦海,就答应了他。

拒马河靠近明朝边境,是蒙古骑兵经常遛马的地方。没等万户人到,班背就死在了蒙古人的刀下。遇难前,他让随从把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火箭书》带了出去,交到万户手上,希望他完成自己的飞天梦想。

惊天一爆为梦想牺牲

万户经多年的研究,从军中广泛使用的火箭中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飞龙”火箭,射程可以达到 1000 米。理想终于完成,如钱学森教授所说“将人送上蓝天,去亲眼观察高空的景象”。虽然是在 600 多年前,虽然是百分之百的送死,但是万户还是迈出了人类走向太空的第一步。他在椅子后面捆绑了 47 支“飞龙”火箭,借助火箭向前推进的力量,太空似乎不再遥远。他还想到了着陆问题,准备了两个大风箏,以为这样就可以平稳地降落。

起飞那天,万户坐在飞天椅上,平静地吩咐仆人举起火把。班背的梦想,他的梦想,无数古人的梦想,那一刻在他的口中化作两个坚定的字——点火!随着一阵阵轰鸣声,火箭喷出一股股火焰,“飞龙”火箭把万户推向高空。正当地面观看的人群欢呼的时候,第二排火箭自行点燃了,一声巨响,万户连同“飞天椅”一起坠落在万家山……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类航天先行者,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次国际天文联合会上,众人将月球上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将他的名字永远写在了他梦想触及的地方。(据《周末报》)

陈独秀之女的坎坷人生

1956 年,安徽籍的中年妇女陈子美和丈夫李焕照全家,从上海迁居广州。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关进牛棚,批斗游街,遭受种种折磨。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个深夜,年近 60、遍体鳞伤、披头散发的陈子美,用一生的积蓄和首饰,秘密请人把自己绑在一只汽油桶上,冒死偷渡去香港。

这位老妪,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

幼年辛酸 婚姻不幸

陈子美生于 1912 年,为陈独秀与妻子高君曼所生,她还有一个比她小一岁的弟弟陈鹤年。陈子美 10 多岁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之时,陈独秀忙于公务,顾不上家庭,他们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父母感情破裂后,他们姐弟随母亲离开上海独居南京破草屋。生活所迫,她与弟弟鹤年不得不半工半读,进入职业学校;她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又学妇产科。她快毕业时,母亲高君曼久病无钱医治而死。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比她大 10 岁,在南京银行和供销社供职的张国祥相识、相爱。张国祥与陈子美结婚前已经有妻室子女,但他一直瞒着陈子美。1936 年,陈子美生第三个孩子即二女儿张树德时,张国祥找来一个称之为“表

妹”且带着个孩子的保姆来照顾她。不久,这个“表妹”保姆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就是张国祥的结发妻子蔡氏,那个小孩即是张国祥与蔡氏所生最小的女儿。此时的陈子美如梦初醒,她与张国祥大吵并要与之离婚。张国祥无奈,只得与结发妻子蔡氏离婚。

1937 年,陈子美与张国祥携二子三女避难重庆。1938 年 8 月,陈独秀偕同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也避难于与重庆毗邻的江津。陈子美要去看望父亲,但张国祥不让她去。原来,1932 年 10 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判刑关押在南京监狱,此时张国祥与陈子美已完婚,陈子美带着张国祥去狱中探望陈独秀。当陈子美把自己与张国祥的婚事告诉父亲时,陈独秀十分不快,厉声斥责道:“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父女俩在狱中吵了起来,陈子美与张国祥转身就走。后来,张国祥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阻止陈子美去江津看望陈独秀。

1939 年 5 月,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大轰炸。陈子美又匆匆逃离重庆,经昆明到香港。

陈子美一家在香港小住后,又取道回上海。不久,陈子美与张国祥的感情彻底破裂,她带着 4 个儿女另租房分居。抗战期间,上海滩物价一日三涨,生活越来越窘迫。于是,陈子美带着子